

一只手炉 一段历史



毛泽民。

在全国各地的红色纪念馆内，几乎每件文物都映照着我们党的初心。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些“红色文物”，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及人文精神，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践行使命担当。

铜手炉又称“袖炉”“手熏”“火笼”，《辞海》中解释为：“冬天暖手的小炉，是旧时宫廷乃至民间普遍使用的掌中取暖工具，多为铜制”。据专家考证，手炉是从火盆使用中演变过来的。到了唐代，人们开始用铜制成手炉，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当时的手炉器型以“簋簋之属为之”，即方圆二式，里面放炭或尚有余热的灶灰，小型的可放在袖子里“熏衣灸火”。随着时代的变迁，手炉已淡出生活的舞台，逐渐被人遗忘。

宁夏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珍贵革命文物——毛泽民使用过的铜手炉，见证了发生在革命老区盐池的一段历史故事。

盐池县是宁夏唯一经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3个时期的革命老区，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1936年红军西征在宁夏建立的6个红色县级政权中唯一坚持到全国解放的一个县。盐池县的战略地位重要，又盛产食盐、甘草、



毛泽民用过的铜手炉。

毛泽民还深入群众中，和他们谈心，了解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及时纠正正在打土豪过程中发生的偏差，保护了工商业者的利益。百姓家的炕头、工商业者的店铺、街头小贩的地摊，常能看到毛泽民的身影，一身布衣、一个铜手炉，拉近了群众的距离，盐池城里的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毛青天”。

毛泽民在这里工作了近半年之久，帮助盐池县建立消费合作社，组织当地土特产品向外地换回军民急需物品，为缓解盐池的经济压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毛泽民认为：“合作社是群众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只要我们有了好的方法去领导，是容易组织起来的。”他还组织建立了三边贸易局、盐池县税务局等经贸机构，着手恢复当地经济，为盐池当地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1936年12月，毛泽民、钱希均夫妇离开盐池回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时，将

铜手炉送还给盐池县委。毛泽民在盐池县活动时间虽短，但对当地商业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组织人民互助合作，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打破了敌人封锁、保卫红色政权、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宁夏博物馆成立后，原回汉支队政委梁大均将这件珍贵的铜手炉捐赠给了宁夏博物馆。2000年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革命文物鉴定委员会评定为一级红色文物。细观此炉，光泽度极好，红铜制造，长方形，长16厘米、宽12.5厘米、高9厘米，在两侧搭接有一个桥形提手，盖子中间有一“寿”字形镂空花格图案。

看着铜手炉，就想到毛泽民组织盐池人民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情景，他带领盐池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他用自己卓越的经济才能，使盐池成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大后方。在他的指导下，盐池人民对陕甘宁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力地支援了中国革命事业和边区的经济建设。（据参考网）

红军长征经过宁夏留下的档案史料

宁夏作为红军长征途经的战略要地，从红二十五军率先翻越六盘山，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再到山城堡战役结束，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宁夏的山山水水和各族人民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战斗岁月，彰显了宁夏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独特作用。

1935年7月，为配合红军主力北上行动，红二十五军转战至宁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并翻越六盘山，驰援陇南陇东，截断西兰公路，打乱了国民党军围堵中央红军的部署。红二十五军在沿途中四处号召

广大群众的分粮斗争，充实了红军物资的需要，有力地帮助了红军主力的行动。

1935年10月5日，红军陕甘支队从甘肃界石铺、高家堡等地出发，分两路北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随一纵队行动，当晚宿营于单家集。10月6日，红军陕甘支队分别从驻地出发向六盘山挺进，毛泽东等率中央领导机关从单家集出发。10月7日，陕甘支队主力部队沿王套、后莲花沟向六盘山挺进。陕甘支队一纵队在青石嘴与敌军骑兵第七师第十九团两个连相遇，歼敌骑兵

200多人，缴获战马100余匹，马车10余辆，胜利通过六盘山封锁线。

1936年5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组成西方野战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进入陕甘宁边界地区作战，以实现扩大、巩固根据地和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战略目标。西征红军分左右两路由延川县一带出发，向甘肃、宁夏挺进。随后，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颁布对回民工作的“三大禁条”“四项注意”。西征部队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攻

占了甘肃东部的阜城等地和陕西西北部，直至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城一带，开辟了新根据地。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右纵队到达公易镇，总指挥贺龙率左纵队到达将台堡、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师。至此，红军一、二、四三大主力历尽艰难困苦，浴血奋战，终于胜利会师，长达两年之久的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在宁夏的革命活动从政治、军事、物质、精神等各个方面聚集力量，为迎接革命曙光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据《中国档案报》）

■宁夏党史人物 ■王振举：心里只有为人民服务

王振举的人缘好，有很多掌握税务的“线人”。其实，他对“线人”的回报也就是让人家进门喝口水，递上一支烟，随便拉拉家常而已。但往往在此过程中能查问出税源来。一次，王振举派一名年轻的专管员去姚河村收一家卖木头的税。这名同志到那转了一圈便回去了：“人家说了，木头没卖，没税。”“没税？”王振举慢慢悠悠地点出了是谁家伐了几棵树，是什么车拉的，是谁帮着装车的，檩条是什么价，大梁是什么价……年轻人听了，心悦诚服，又返回姚河村收回了那笔税款。

从走进税收队伍的那天起，王振举就把“该收的税分文不少，不该收的税毫厘不要”作为衡量工作的一把尺子。1983年春天，一名年轻的税收入到姚村征税时，由于不熟悉政策，错征了牲畜交易税。当天晚上，王振举在煤油灯下审核票证时发现了这一错误。第二天一早，他就让这名税收入到几十里外的姚村退还了误征的203元税款，并向当事人赔礼道歉。

1986年秋天，王振举的一个表侄在姚村贩卖生猪，王振举找上门去征税，表侄说他的猪都是高价买的，征税就会赔本。在场的群众也劝王振举说：“国家这么大，哪里缺这几个钱？”可王振举耐心给大家讲政策：“亲是亲，公是公，皇粮国税，人人都得缴，我不能拿权力亲厚友，让国

家吃亏。”就这样，王振举坚持一分不少地征回了税款。1987年8月，红河乡宽坪村一名农民到新集贩卖菜，王振举去征税，那名农民软磨硬泡，拒绝缴税，又乘机溜走了。第二天，王振举骑上自行车，边走边问，山高坡陡，他又步行十几里山路，找到贩卖的农民家。王振举听说这名农民当天被大雨淋感冒了，就拉着他的话说：“你看，几个税钱把你吓跑了，现在病了，有感冒药吗？”这名农民感动地说：“你大老远赶来，不但没罚款，还安慰我，要知道你心这么好，我昨天就不跑了。”说着，把税款交给了王振举。

1989年，组织上安排王振举到彭阳县国税局担任人秘股股长。6年间，王振举经手500多万元现金，也曾多次接待过客人，但他没有抽过公家一支烟，没有喝过公家一盅酒，没有吃过公家一顿饭，没有因私事用过公家一回车。王振举抽烟很厉害，但坚持上班不抽烟，晚上回家自己卷旱烟抽。他的4个孩子相继结婚，都没有用过局里的车接亲。一次，二女儿的公公患重病，需要到固原治疗，想请王振举派车送一下，被他拒绝了。同事们敬佩地说：“老王既管钱又管物，但却两袖清风，心里只有为人民服务。”王振举对待同志的那份真诚，谁听了都会为之感动。特别是那些曾经和王振举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一提起他们的王叔，总是感慨

万分。收了10多年税的袁小平每每拿出税票，就想起他刚参加工作那年哭着跑完的30多公里山路。那天早晨，王振举带着袁小平爬了5公里陡坡，走了5公里土路，翻了一座山，跨过一条河，快中午时赶到红河乡集市去收税。可袁小平匆忙之间竟忘了带税票，王振举铁青着脸执意要袁小平回所里去拿。情急之下，袁小平恳求先用王所长的税票，但王振举硬是不答应。万般无奈，袁小平只好服从命令，他一路走，一路哭，来回6个多小时，回到红河乡时已是暮霭笼罩。此时，王振举已经收完税，正站在路口焦急地等着袁小平吃晚饭。经过一席交谈，袁小平真正理解了王振举常说的“税票是国家给咱们的权力，可比咱们的命还重要”的深刻含义。

1995年6月，王振举感到身体不适，胳膊明显不听使唤，妻子不止一次地催他去看病，但他忍着病痛，继续工作。9月中旬，病情加重，在妻子和儿女的再三劝说下，他才同意到固原地区人民医院检查，医生让他立即住院治疗，但他只同意在家里养病。

1995年12月，自治区党委作出决定，号召全区税务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向王振举学习。1996年4月20日，王振举因肺癌去世。

王振举去世后，他的事迹被编为话剧、拍成电视剧，广为传颂，引起强烈反响。（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鹤民岁月 第一百二十六期

YI MIN SUI YUE

王志洪：把文化“大篷车”开进千家万户（三）

随着这批大学毕业生的到来，宁夏话剧团也随之成立。王志洪第一次在舞台亮相已经是1965年，演出的剧目是《金梁玉柱》，主题思想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来还排了几部有影响的戏。《豹子湾的战斗》《女飞行员》等，这几部戏里都有高大的英雄人物，王志洪在戏中担任主角，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场场爆满。年轻的演员们积极性也特别的高涨。银川观众争看话剧的场景让王志洪特别感动，对话剧舞台有了种神圣感。文革期间，王志洪的演艺生涯也受到了影响，剧团解散了。

王志洪：文革时没其他戏可演，就八个样板戏，还是京剧，话剧团也解散了，人员全部下放到各行各业。

我们有到粮店卖粮的，有到食品店卖酱油的，我被分到了银川电表厂烧了3年多锅炉，直到1972年落实政策，我们才又被重新招回到文工团话剧队。大家重新聚集到一起后才知道，很多同学调走了、剧团散了、舞台没了，留下的没几个人。1978年重新恢复话剧团的建制，才把大家又重新拢到了一块，我们又开始排戏，这时又迎来了话剧舞台第二个春天。

但话剧舞台的热火劲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新的压力又来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电视的兴起，热闹非凡的话剧舞台又几乎在一夜间跌到了冰点，万人空巷的演出场景成为记忆，观众全被电视吸引，座无虚席的剧场变得空空荡荡。所有的话剧人在突然冷淡的市场寒冬面前表现出极度的措手不及，毫无应对之策，很多演员为了生计纷纷“下海”，有的人去歌厅伴唱，有的人去开小饭馆，有的人跑起了小买卖。这些几乎都发生在一夜之间，很多人把对艺术的追求变成了对过往的怀念。

王志洪：1983年最惨，全年我们才演了8场戏，为了挽回观众，我们还倾尽全力精心排练了一场大戏，本来是信心满满，希望一炮打响，但到演出那天，全场一共来了两名观众，还都是文化系统的熟人，是专门来捧场的，那个惨呀，我站在大幕后边，看着空空荡荡的剧场好想大哭大闹一场。没办法，我就对剧院收门票的师傅说：您把大门打开，不收票了，让人随便进，最后进来的也只有十来个人。那天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记得印象很深，那天电视上在播放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现在我们再回过头看，

电视打垮的不仅是话剧市场，连京剧、歌舞等都受到了影响。

1983年，全国的话剧舞台都面临着生死抉择。也是那年，42岁的王志洪被任命为宁夏话剧团团长。临危受命后的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分崩离析的队伍和无人问津的话剧市场。最头痛的已经不是精雕细琢的艺术，而是全体演员的一日三餐。保证全团百十号人能按时发工资成为当务之急。那年的冬天，全团很多人整天都抱个大茶杯，坐在剧团门前晒太阳，聊天中除了对过去辉煌时光的追忆外，更多的是悲情的牢骚和满世界的看不惯。面对种种难言的苦衷，给濒临绝境的话剧团找出路成为对王志洪最大的考验。

王志洪：我必须找门路，拼出一条生路，还有对话剧艺术的追求和留恋。我猜想，话剧在城市没了市场，但农村肯定还有人想看。因为农民很难看到真人的演出，如果我们把戏送到农民的家门口，估计农民会喜欢。当我向全团提出这个想法后也有很多反对意见，一是大家觉得宁夏农村喜欢秦腔，怕农民群众不接受话剧；二是有些人的观念里还认为话剧是高雅的舞台艺术，不能变成流浪乡间的野艺人。也有很多人支持我这个想法，最后大家商量，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再说，没准能找出条活路来，当年很流行的一句话是摸着石头过河。于是我们决定转战农村，把传统的城市舞台搬到农村去试试，说真的，当时只是权宜之计，让我没想到是，这一试就试出个大市场，试出了个大篷车、试出了个大舞台、试出了话剧舞台的新天地。最早的大篷车就是利用团里的大卡车，把车帮加高，既拉道具也拉演员，到了农村把车帮支平，就成了个小舞台，所有的演员就在这个小舞台上施展艺术才能。

宁夏话剧团的大篷车刚开始也走过弯路，最初并不知道农民喜欢什么戏，总以为农民的欣赏水平低，也有节目胡乱凑合的时候，凑合几个节目出场了，有歌舞小品、有流行歌曲、话剧演员唱歌不是强项，就放录音假唱。有一次演出队在芦花台搭起了台子，旁边有个要猴的摊子，很逗笑，演员们在台上的假唱又被农民听出来了，骂演出队是江湖骗子，轰他们离开。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他们，王志洪从这时候开始逐渐明白，艺术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群众的深刻含义。（拜学英 蔺银生 撰稿）

宁夏近代工业（上）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近代工业多集中于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广大的内陆地区工业经济基础十分薄弱。除过外国人在平罗创办的甘草膏厂，宁夏近代工业就诞生在宁夏建设省后的银川市，即以1933年初在洪广营兴建裕宁甘草公司为标志。当时，马鸿逵主持宁夏省政府，在加强交通、邮电建设的同时，提出了“工业之创办与改进”计划，才为宁夏近代工业的举办以及地方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创造了一定的客观条件。

1938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了“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的战时工业计划；中国战场前方战备和后方供给都有待于西部经济建设予以支持。由此，国民政府加大了西北工业建设力度。另外，早在1937年11月，随着国民政府迁驻重庆，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确立，特别是1942年8月“开发西北”号召的提出，都为宁夏近代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近代工业创办形式主要为官商合办、集资合办、独资创办。按门类分，宁夏近代工业又以面粉、制革、纺织、造纸、印刷、制药等企业为代表的轻工业为主。

印刷、造纸业。1935年，宁夏省政府筹资2.7万余元，开设普利机器面粉厂，后改为军队附设，日产面粉40余吨。1943年春，该厂因机器陈旧而停产。同年8月，在省城南门外成立利民机器面粉公司，日产250袋“双塔”牌面粉，除供军机关食用外，也供商民食用。面粉业。1935年，宁夏省政府筹资2.7万余元，开设普利机器面粉厂，后改为军队附设，日产面粉40余吨。1943年春，该厂因机器陈旧而停产。同年8月，在省城南门外成立利民机器面粉公司，日产250袋“双塔”牌面粉，除供军机关食用外，也供商民食用。

制革业。1933年，在宁夏城垣北关建立起富有被服厂制革组，由军队附设，以生产军装、马鞍及党政军学界的制服业。1940年，年产蓝底皮120张、羊皮140张、红底皮100张。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制革化学原料缺乏等原因，业务范围较前缩小。

纺织业。抗战期间，纺织业在宁夏也获得较快发展。宁夏省政府先行筹资设立省立初级职业传习所，传授纺织技术，组织学员生产。该所在经营中获利颇为丰厚。接着，便成立宁达棉铁厂，生产呢料、布匹等日用品销往省内外。

1940年，宁夏省政府从中央建设专款中拨出6.4万元为资本，筹建起宁夏省毛织工厂。1942年初，马鸿逵及其幕僚集股8万元投入宁夏省毛织工厂，并归还建厂时所用的中央建设专款，又将省立初级职业传习所与该厂合并，改称“兴夏毛织公司”，马鸿逵自任董事长。这样，该公司实际上由所谓官办改为马鸿逵等的私人企业。

1944年，兴夏毛织公司又兼并了刚关闭的商办企业大夏机器纺纱厂。随后又有几家商办纺织工厂开工投产，使得宁夏纺织工业的发展速度明显超过其他轻工业企业。（据《历史银川》）